

晚清數字政治的開端—— 從《列國歲計政要》的譯介說起

韓承樺*

數字是用以描述和定義自我及外在世界的基礎工具，它的公共性質時常容易引發政治性議題。本文以《列國歲計政要》這份根據英國《政治家年鑑》(*The Statesman's Yearbook*)1874年數據資料翻譯的文本為核心，描寫它所觸發的三種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缺乏數字的焦慮感、以數字為核心的新表述方法，以及數字即同事實的想法。這段變化提供我們觀察晚清數字政治的發源、數字參與中國現代轉型的實踐與經驗，它也是1920年代人們崇尚統計數據與社會事實的序曲。本文以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的角度，嘗試結合社會循環流通和日常實踐兩個面向，描寫這些通過統計處理的數據，如何逐漸被知識人認為是一種可靠且指向事實的知識形式，以及解決中國當前困境的重要資源。自域外輸入的統計數字，讓清政府認識到自己在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落後。這段歷史經驗是一種中國因缺乏統計技術和量化資料，以致於為了追趕數字生產所陷入近似形式主義的困境。這段經驗更展示了國家如何通過數字來具象化地認識諸多政治挫敗帶來的現實困境與「事實」。

關鍵詞：數字、統計學、《列國歲計政要》、知識史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模糊且不夠精確是中國社會普遍性問題，就像胡適(1891-1962)在〈差不多先生傳〉結尾處提到的「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這篇寫於 1920 年代的文字，以譏諷筆法道出中國人不夠注重事實，忽視精確的現象。文中的「差不多」細節裡，有一處描寫傳主書寫時的馬虎習慣，「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但對傳主來說僅是「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是個「差不多」的錯誤。¹這種書寫的誤差，反映了國人無法精確掌握及表達數字的現象；又或者說，當時的中國人還沒建立以數量來認識世界的習慣。胡適誇張其詞，是為描寫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差距；而數字本身也確實是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後與域外接觸、交流的過程中，逐漸發現自身和西歐國家之顯著差距的「帝國知識」。²這些自外輸入的數量化文本定義了現代國家的基

¹ 胡適，〈差不多先生傳〉，《興華》，21：26(上海，1924)，頁 24。筆者目前無法找到胡適發表在《新生活雜誌》的版本，據悉此文於 1919 年就刊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適紀念館藏檔案裡亦無收藏此份資料，僅能暫時以 1924 年的版本為準。

² 車泰根的論文，將晚清以來陸續出現在市場上的數量化文本描寫為一種「帝國知識」，而中國知識人接觸這類文本的過程，就是依循著帝國運用數字所建立的認識世界的框架，並意識到必須透過搜集本國量化資料來擺脫困境。車泰根，〈數：帝國的算術和近代世界〉，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 2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237-251。目前已有許多研究關注數字觀念與現代文明的關聯性，如車泰根徵引的《萬物皆可測量》，討論歐洲社會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出現以「數量」(quantity)取代「性質」(quality)為闡述事實的新模式。該書作者認為，這段變化牽涉了科學知識的新作法、繪畫、音樂等藝術表述形式、商業實踐方法以及官僚系統、制度的運作邏輯和模式；這些改變讓西方國家在前近代時期成為世界上較善於以「量化」為基礎思惟方式的地域。這種「思惟習慣的運用

礎要素，也讓中國瞭解，系統性搜集數字資料是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越需要量化資訊的時候，中國社會能妥適運用數字的能力就越顯困乏。這在 20 世紀初期，對抗美、日帝國勢力的「商戰」風潮中表現得十分清楚。在民族主義的目標下，支撐經濟論述的訊息，就是乘著印刷資本主義流通的數字。各種經濟調查或海關統計報告，就是時人撰文立論的依據。譬如，時任上海銀行公會駐日通訊員的徐滄水(1895-1925)，在 1919 年 5 月發表的〈歐戰以來日本在我國貿易〉一文，就根據《日本大藏省貿易年報》註錄的「近五個在我國輸入之貿易統計」，推論棉織品和棉紗是日本輸入中國商品的前兩名。這篇典型的商戰文章由文字論述與數字圖表組成，這種複合結構顯示作者擁有運用統計數字的基礎知識，而社會大眾卻並不具備識讀圖表的能力。該文談及，國人無法確實得悉抵制日貨行動的實際效果，亦無可獲知日本大量輸入了哪些商品。對於人民不能從數字來理解貿易順差與逆差，徐氏慨嘆為「國民之不長進」。而能藉由數字掌握事實的徐滄水，則是「吾讀此表，惟有觸目驚心而已」。³另一個例子是著名實業家張謇(1853-1926)。1922 年，日本政治家鶴見祐輔(1885-1973)遊訪中國，旅途中曾與張謇見面，並就中國人口成長和經濟發展交換意見。針對這次會面，鶴見在遊記中留下「在自己會見的許多中國人中，張謇是唯一一位會

方式」(utilization of habits of thought)的巨變，並不是普遍認為的科學和技術，而是以量化來描述與衡估「真實」(reality)的「心態」(mentalité)；這就是作者認為現代歐洲的顯著優勢。Alfred W. Crosby,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x-xi.

³ 徐滄水，〈歐戰以來日本在我國之貿易(上)〉，《銀行週報》，3：16(上海，1919)，頁 9-12。

用數字立論者」的紀錄。⁴這兩種材料勾勒出另一種解讀「商戰」的方向：⁵這場運動其實是少數能運用數字描述現象和討論問題者，透過數量化語言來動員多數無法掌握此能力者，以抵制帝國主義的入侵。帝國的商貿數字，映照出中國社會對自身經濟發展概況的無知，也進一步揭露了中國人數字識讀能力低落的事實。

然而，中國不是沒有數字觀念和知識；本文想討論的是，數字被當作一種新的知識形式，在近代中國引起的改變與可能牽涉的面向。對此論題，過去學界多集中在社會調查，以及統計學的輸入、應用和影響，且從民國以降社會學學科建制的歷史脈絡探索。⁶關於調查和統

4 鶴見祐輔，《偶像破壞期の支那》（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據1923年鐵道時報局刊本影印），頁75-77、247。關於商戰的數字現象，筆者是閱讀陳以愛近著所獲致之相關材料、線索和靈感。筆者不敢掠美。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1），頁34、37。

5 關於商戰、抵制運動，學界已積累豐碩成果，可參見：朱英，《商民運動（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6 調查與統計學之於政治、社會、文化範疇的互動經驗，西方學界發展較早，可參見：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eds.,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odore M.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odore M. Porter,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以近代中國為場景的討論可參見：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Arunabh Ghos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計學，燕京大學社會系李景漢(1894-1986)的經驗是很典型的例子。李景漢在《實地社會調查方法》一書中，提及他在美國讀書時，老師曾詢問他關於中國的男女比例、工資漲跌指數以及土地分配等情況，他卻無法在這個彷彿萬國縮影般的教室裡，提供準確的統計數據來介紹自己的國家，這讓他感到深深的恥辱。⁷李景漢的經驗，將中國缺乏統計數字的問題和國恥緊緊綁在一起，這使得我們容易將中國追求以統計知識來管理國家內部複雜事實的過程，理解為一場以知識革命來鍛造民族國家的運動。⁸於此，特定學科建構過程中的複雜經驗，或可被描寫成是為了形塑某種學科知識以搏成民族國家的線性歷史。

知識不僅是手段或工具，也是行動主體。本文採用知識史研究(history of knowledge)的取徑，把知識當作特定時空脈絡下具有理性權威的特定實踐；從而考慮統計數字這類知識的權威與合理性是在何種政治、社

University Press, 2020). 黃興濤、夏明方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北京：西苑出版社，2020)。值得注意的是漢學家白安雅(Andrea Bréard)對中國數學與統計學的研究成果。她關注統計學之於中國量化知識、技術現代轉型的角色，以及對於國家、社會範疇的廣泛影響。Andrea Bréard, "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 Studies* 40:3 (July 2006): 605-629. 王幼軍、白安雅，〈統計學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從社會統計到數理統計〉，《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上海，2010)，頁 61-67，轉頁 74。Andrea Bréard,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odernity: Essays on the Global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of the Science of Numbers in China*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⁷ 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收入《民國叢書》第3編第17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據1933年星雲堂書店版影印)，頁10。

⁸ 關於近代中國學科史研究與民族國家的問題，可參見韓承權，〈「社會」的形塑與發展：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0(臺北，2023)，頁149-150。

會、文化環境中，通過哪些歷史行動者的實踐而建立。⁹也就是說，應該去追問清末民初之際，人們為何願意選擇相信統計數字？本文嘗試結合知識史研究的兩個範疇——知識的社會面向(societal dimensions of knowledge)與知識在常民生活裡的輪廓(contours of knowledge in people's lives)——前者考慮知識與政治、社會、文化的互動，從這些交織的脈絡與經驗來考量知識環流(circulation)的問題；後者思考特定知識在常民世界中的實踐，關注知識在規範生活世界以及形塑日常行動(lifeworld and everyday actions)的作用和經驗。¹⁰據此來觀察統計數字和觀念如何在循環流動過程中被反覆形塑與重構(formed and reformed)，最後成為晚清士人認識自我和世界時一種可靠的知識實踐形式甚至是日常規範。¹¹

這是知識與非知識領域交織互動的過程。統計處理後的數字，反映了從特定社會情境和文化條件孕育出的選擇及行動；該數字在社會中的傳播，更揭示了量化知識的政治性質以及對公共領域可能產生的

⁹ 知識史研究相當借鑑新文化史和社會史對脈絡與結構的認識，並嘗試以此操作歷史化知識的作法，可參見：Simone Lässig,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da,"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59 (Fall 2016): 29-58; Helge Jordheim and David Gary Shaw, "Open Doors: A Turn to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December 2020): 3-18.

¹⁰ Johan Östling and David Larsson Heidenblad, "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History of Knowledge: Key Approached for the 2020s," *Journal of History of Knowledge* 1:1 (July 2020): 2-3.

¹¹ Johan Östling and David Larsson Heidenbla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16. 對知識史研究者而言，主要討論的是在特定時空中，人們如何運用知識來定義自我和世界，並將其視為真實的實踐和經驗。也就是說，透過知識來展現真實的理解並建構法則的行為，都具有特定的時空環境性質。而知識史一方面要描寫這類經驗，一方面則要藉以理解時間、環境中各種具影響力脈絡的特質。

影響。¹²本文擬從 1870 年間出版的《列國歲計政要》來考慮這個數字政治的問題。該書係根據英國《政治家年鑒》(*The Statesman's Yearbook*)1874 年度數據資料翻譯而成，是一種具有西方年鑒(Year Book)性質的文本。¹³這份統計文本觸發了三種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缺乏數字的焦慮感、以數字為核心的新表述方法、數字即等於眼前所見事實的看法——這段變化是 1920 年代人們崇尚統計數據與社會調查的序曲，它提供我們觀察晚清數字政治的發源，歷時性考索數字在近代中國轉型和發展的歷程。必須說明的是，筆者無意主張這是種與傳統的斷裂，反而是思考為何這變化會以近似與傳統斷裂的形式展開。中國並非缺乏數字知識的民族，單從數學與卜算的發展程度來看就已經非常成熟。¹⁴此外，民間商業團體和機構所使用的各種複式簿記也十分進步且完備。¹⁵

¹² 關於數字的政治性質，可參見：William Alonso and Paul Starr, eds.,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7). 該書以 1980 年代美國人口普查資料為基礎，討論社會調查技術和官方統計資料與美國政治議題相互交織的現象，突顯出國家治理作為觀察角度的重要性與官方統計數字的政治特質。

¹³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423。關於這部書的相關研究有兩種值得參照：牟國義、沈萌激，〈《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鑒譯介〉，《中國年鑒研究》，2019：3(北京，2019)，頁 29-42、轉 78；李章鵬，〈《列國歲計政要》的翻譯出版及其意義〉，《統計研究》，32：9(北京，2015)，頁 104-109。兩文分別從中國接收年鑒文本與統計學知識的角度討論。

¹⁴ 這部分可參見：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陳立夫主譯，傅溥譯述，《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四)》(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¹⁵ 像是：傅建木，〈清代民間會計複式記帳概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廈門，1983)，頁 73-77。袁為鵬、馬德斌，〈商業帳簿與經濟史研究：以統泰升號商業帳簿為中心(1798-1850)〉，《中國經濟史研究》，2(北京，2010)，頁 50-60。Yuan Weipeng, Richard Macve & Debin M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before 1850: insights from the Tǒng Tài Shēng business account books (1798-1850)," *Accounting*

本文討論的數字知識，指的是通過統計所形成的一種可靠且指向事實的知識形式。結合知識的社會循環流通和日常實踐兩個面向，筆者嘗試描寫這些量化訊息，如何引導國人發現清政府於文明發展進程中面對的困境，進而觸發了社會對數字資料的需求，也突顯中國統計知識的落後。而這既是諸多政治挫敗後的現實困境，也是透過這世界大量數字所具象化的一種「事實」。

二、「自強之源必由實算」：缺乏數字的焦慮感

從域外大量輸入關於異國土地各種量化描述及介紹，觸發了清帝國對自身數字匱乏的焦慮，朝野開始以所謂的「數字形式訊息和知識」為命題展開討論，亦即中央或非中央機構針對特定目標調查、搜集並統計的量化知識。結果引出了中國人是否能運用統計數據這項現代工具來描述和評估現象，進而形成一定程度的知識基礎以利相互溝通的疑問。這一疑問發生在 19 世紀中葉，顯示當時中國缺乏運用數字知識來認識和解讀世界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卻是同時期現代國家普遍具備的。就如一篇 1912 年的短文〈數字源流〉所言，「識數」的能力逐漸成為人們衡量民族「進化自然之階級」的標誌。¹⁶在這個脈絡下，中國朝文明世界進化的過程，可以被描述為一段追逐現代統計數字知識的進程。

統計數字何時成為中國人描寫和評估世界的依據？這要從清末最受矚目的量化文本，1875 至 1876 年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1836–1907)口譯、鄭昌棧筆述、江南機器製造局出版的《列國歲計

and Business Research 47:4 (2017): 401-430. 這部分要感謝審查人提示。

¹⁶ 佩玉，〈數字源流〉，《教育界》，5(江蘇，1912)，第五版。

政要》談起。¹⁷正是這部書引起時人注意這種利用數字將觀察對象轉化為可測量、可比較與理解主體的特定作法。1881年，江南製造局將《列國歲計政要》與其他異國史政書籍送至總理衙門。¹⁸此時洋務運動方興未艾，清廷接連面臨俄、法兩國對邊疆及藩屬國的嚴峻挑戰。中國明顯需要對域外情況有更豐富且透徹的理解，包含《列國歲計政要》在內之史政書籍，正是「合己所緊用者」。¹⁹這表示，中國人是在外在挑戰加劇的情況下，才逐步體認到數字之於國家的重要性。

年鑒這種文本必須在定時、定量的統計資料上進行編纂，這種結合了調查與統計以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技術，在西方世界發展歷有年所。事實上，西歐很早就嘗試以數量進行行政控制，1086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 1028-1087)就清查了英格蘭地區的財產，而編就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從此開創了一種延續至十九世紀末的調查傳統。²⁰現代定義中那種具備社會科學知識與社會改革關懷的「社會調查」(social survey)即奠基於此。²¹在這段發展過程中，有四個面向的進展

¹⁷ 此書出版的確切時間，筆者目前得見兩種說法。一為潘光哲考據的1875年，一為牟國義、沈萌激考據的1875年刊刻，1876-1877年間裝訂成書、出版。由於目前能找到的相關史料，僅是譯者序和《萬國公報》最近期廣告，數量仍不多，無法做更精確的判斷，筆者僅先暫記於此。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頁45。潘著於2021年修訂再版時，仍維持原本考訂的1875年。牟國義、沈萌激，〈《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鑒譯介〉，頁36。

¹⁸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413。

¹⁹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394。

²⁰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s.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5. A. H. Halsey, *A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Britain: Scienc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4.

²¹ 這裡談的「社會調查」，是指針對特別選定的社區或群體所操作的一手(first

交織在一起。第一為十七世紀英國調查家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構思，以計算國家人口、政府收益及國計民生的「政治算數」(political arithmetic)為主體。第二，十九世紀中期興起的「統計運動」(statistical movement)，關注焦點從單純的人口考察轉移至各項社會問題，英國各城市分別成立統計學會與社團，攜手吹起一股「量化轉變」(qualitative change)的風潮，影響了社會被審視、觀察的方式。第三，量化研究方法被視為社會改良主義(meliorism)的科學工具。第四，英國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及變化。²²跨入二十世紀的社會調查，已具備和《末日審判書》截然不同的知識內涵和技術導向。可以這麼說，近代世界逐漸凝聚出一種以數量來轉化人們觀看、理解與描述社會現象的科學方式，探索對象也從具體的土地、財產、人口擴展到諸如道德這類的抽象問題。由是，人們不自覺地浸潤在這個由數字打造、管理及定義的框架中。

由此可見，對中國讀者來說，《列國歲計政要》既是認識域外萬國異象，更是在接觸一種還未能掌握的知識技術。當然，該書並非中國知識界首次接觸現代調查與統計。相關研究顯示，早在 1830 年代，就有刊物斷續登載特定項目的統計資料。例如，1835 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曾刊登過部分英屬殖民地和一些國家的人口數，並拿其與中國做簡單比較。此外，新式海關(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出版的貿

hand)考察、分析以及結合經濟學、社會學或其他面向知識的探究。社會調查提供科學搜集的材料予以社會理論家建立論點，抑或是考察特定團體、社區生活或工作情況的科學資料，以制定改良計畫。要言之，社會調查可被視作一種探究或分析社會現象、問題的特定科學工具。此處定義筆者參閱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

²² 這四個面向主要參閱自: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5. 其中「qualitative change」來自第 7 頁。

易統計也是從清中期就出現的報告，這類出版品從 1859 年開始編纂，延續至 1949 年為止，是種制度化行為。²³海關對於統計資料的編纂和刊布十分重視。1873 年，第一任總稅務司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為此特別設立了「造冊處」(Statistical Department)，學者白安雅(Andrea Bréard)認為該機構通過印行、刊佈數字資訊，製造了貿易統計表的流通性，呈現統計數字作為「公共知識」(public knowledge)的特性。²⁴整體而論，在 1895 年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社會可能接觸到的統計資訊，已從片段翻譯和介紹演進至定期生產和公開發行的量化數據。

既然《列國歲計政要》並非孤例，它的特殊性究竟為何？它是一種經過編譯改動過的文本，且與海關定期出版的統計報告相比，更不具穩定和連續性，為何能引起晚清知識界關注且接續編譯的熱潮？這裡要先用另一個早於《列國歲計政要》的例子來討論。1874 年，同樣在林樂知主持的教會期刊《萬國公報》第 301 期中，刊出一篇〈有和約之十五國與中國相較事〉的文章，該文比較中國和俄國、英國、美國、法國等十五個國家在「地界、民數、教會、錢糧、國用、國債、兵丁總目、砲船數、通商船、進口貨、出口貨、鐵路里數、電線里數、信館寄信數目」等項目的數量。編者自言，資料來自 1870 到 1873 年

²³ 這裡的討論仰賴：李章鵬，〈《列國歲計政要》的翻譯出版及其意義〉，《統計研究》，32：9(北京，2015)，頁 106。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學的傳入與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興起〉，收入黃興濤、夏明方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頁 3-5。

²⁴ 不過，她只是將期刊發行的事實直接連結到資訊公共化的結果，沒有明確說出這類文本的「公共受眾」為何？Andrea Bréard, "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605-629. 關於海關造冊處的出版成果及文化，可另參見：邢宇晨，〈海關造冊處：中國最早開展出版貿易的機構〉，《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3(北京，2021)，頁 169-179。邢宇晨，〈近代中國東學西學與文化傳播：海關造冊處西人作者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23：4(北京，2023)，頁 17-26。

的「各國每年所出清單」，尤以 1872、73 年為大宗，可見這篇文章應該改編自某種定期統計資料集。值得注意的是，清單上關於中國的各欄，許多都用「約」、「不計數」、「有奇」、「無定數」來表述。²⁵也就是說，當此文滿足讀者對各國現況好奇的同時，它還揭示了，相較於他國能穩定產出數據，中國明顯欠缺製作量化知識的能力。

《列國歲計政要》也製造了類似印象。當時多數讀者尚不知悉年鑒這類書刊的性質及特點，更不清楚林樂知在編譯《列國歲計政要》時，以「我國家部例外人罕聞，故其書獨略而不詳」為由抽掉了英文原書關於中國「帝王與皇族」(Reigning Sovereign and Family)、「政府和歲收」(Government and Revenue)、「人口、貿易和工業」(Population, Trade and Industry)、「貨幣、度量和尺度」(Money, Weights, and Measures)四大主題，不小篇幅的敘述和數據。也就是說，中國讀者在書中看不到原書關於自己國家的篇章。然而，事實上，原書採用了官方與非官方資料來描寫中國，特別是 1864-1868 年的海關統計。林樂知「我國家部例外人罕聞」之說無法成立，世界其實是想盡辦法掌握中國的情況，也確實有統計資料流通在外。這樣一來，譯者的刻意改動，反倒讓中國在該書的比較序列，失去以數字敘明自身境況的機會。²⁶和上段揭糞的例子相似，筆

25 不著撰者，〈有和約之十五國與中國相較事〉，收入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 1 冊(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頁 14-18。

26 林樂知此舉之意涵目前尚難得悉。有論者認為，林氏不願意中國政體以及皇帝的內容被納入原書，以西方政體範式來書寫和討論。牟國義、沈萌激，〈《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鑒譯介〉，頁 34。細究原書，分成歐洲與非歐洲區域國家兩個部分，在非歐洲區域下規劃「亞洲」區，包含錫蘭、中國、印度、日本、香港……等九個國家與地區。中國是第二個被提及的。Frederick Martin ed.,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Civilise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4), 637-644.

者認為，《列國歲計政要》製造了一個沒有中國的世界政治群像，再透過量化書寫和呈現方式，引領讀者進入一個由統計數據打造的萬國圖景。這樣一來，中國的缺席就意謂著必須透過追趕數字才能加入這批先進國家的行伍。這可能是《列國歲計政要》在 19 世紀後期吸引知識人、官方機構乃至於閱讀公眾注意，進而呈現統計知識公共化特徵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當時多數讀者是懷著尋求富強的目標來搜讀和接續編譯此書的。年鑒史研究者指出，「列國歲計政要」類書籍的出版熱潮，跨越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新政三個時期，歷經中西合譯到國人自主編譯乃至於官方介入的演變過程，在在反映這類書籍在晚清書肆的搶手程度。²⁷1877 年，《列國歲計政要》甫問世，《萬國公報》隨即刊文介紹。該文首先批評《西國近事彙編》這類新聞編譯「沿流忘源」，接著說《列國歲計政要》「足以觀泰西富強之本」，「其裨時政而助遠略」。²⁸這種認為年鑒的統計知識，可信度高過新聞資料，且更接近西方文明本源的看法，在當時尚稱普遍。特別這類書籍陸續被收入《富強齋叢書正全集》(1875)、《西學大成》(1895)等書目中，更體現時人出於「富國強兵」的特定考量。²⁹二十世紀初期出版的幾種

27 牟國義、沈萌激，〈《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鑒譯介〉，頁 41。

28 百不如人，〈新出列國歲計政要〉，收入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 6 冊(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頁 3888。

29 王韜，〈序〉，《西學大成》，第 1 冊(上海：醉六堂書坊，1895)，頁 1a。白安雅指出，數理統計的概率觀念在 1880 年就譯介入中國，卻無法引起注意。要到甲午戰敗後，出於尋求富強的理由，人們才意識到社會統計與國家強弱之間的聯繫。這也呈現了知識歷史發展進程裡的線性和非線性問題。新知識在中國的積累與推進，不一定按照西方世界的發展趨向，而是更受中國環境因素影響。王幼軍、白安雅，〈統計學在近代中國的演變〉，頁 63-64。

新學書目，如《西學書目答問》(1901)、《增版東西學書錄》(1902)、《新學書目提要》(1903)、《譯書經眼錄》(1934)等，則不約而同地將這類書籍歸至政法或制度類，顯然認為它們與政法革新的關聯緊密。³⁰梁啟超(1873-1929)也十分關注《列國歲計政要》一書。首先，他肯定此書對理解西方「富強之原」的重要性。其次，此書「歲歲皆有，或官撰或私述」，提供了一種連續性且具官方立場或開放性的知識，可以讓讀者觀察國家「情實、舉措」的歷時性變化。第三，比較特別的是，梁氏從寫史角度將其與《萬國史記》、《萬國通鑑》、《瀛寰志略》和他種國別史，一同歸類在西學框架的史學知識中。這點第三節會進一步討論。³¹也就是這股探索西方國富民強緣由的動力，不知不覺間推動了國人對統計知識的熱切需求。

翻覽《列國歲計政要》，知識人逐漸知悉，能透過解讀統計數字來瞭解與掌握西方帝國的實態和變化。於是，讀者遂藉著閱讀此書，逐步建立起數字和西方國家強盛之由的關聯。當時有兩種讀後意見反映了這樣的傾向。第一，這類書提供關於國家基本設施即時且真實的數字，是歐西國家「目前切近情形」的真實資料，不像《山海經》、《穆天子傳》那種「稗官逸紀」，記載「荒誕不經，一切蠱測之見」。³²亦

³⁰ 請見：徐維則編，《增版東西學書錄》，頁 29；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頁 260；沈兆禕編，《新學書目提要》，頁 390；趙惟熙編，《西學書目答問》，頁 573；四書均收入熊月之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³¹ 第一點可見：梁啟超，〈讀書分月課程〉，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1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 13。第二點可見：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學校七、譯書〉、〈西學書目表：讀西學書法〉，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1 集，頁 82、171。第三點可見：梁啟超，〈讀書分月課程〉、〈西學書目表：西學書目表中〉，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 1 集，頁 13、143。

³² 〈新出列國歲計政要書序並目錄〉，《萬國公報》，458(上海，1877)，頁

有人指出，該書紀錄「人民、土地、學校、國用、鐵路、戰船、電線」等項目，逐年刊行，可勾勒今昔對比，考國政變遷。³³第二，國家行政措施必須以數字為依據與準則。有讀者主張「知數與不知數，國之強弱所由判」，西方國家施政並非「師古」，而是「以算數稽其實事，以實事覘其利弊」。相比之下，行聖王之治的中國，也應該定時搜集數字，以確知「地域、田萊、夫家、六畜、車輦、兵器、貴賤老幼廢疾、貨賄珍異財物」的逐年變動。³⁴這兩類意見隱約提出了一種政治革新的宣言——「自強之源必由於實算」——要求統治者必須建立主動、精準、規律搜集國家各項數字資料的行政能力，且得逐年「簿書」。³⁵可以見得，這種歲計政書以統計知識揭露了西方國家勝出之處，更彰顯中國的核心問題：行政官僚體系還未具備建構數字政治的科學知識與技術。

整體而言，英國《政治家年鑒》的輸入，引起中國社會對這種知識實踐的陌生和欣羨；也造成時人對中國缺乏統計數據的焦慮感。兩者交織在一起，揭開了中國沒有生產統計資料能力的事實，也致使國家在西國編製的年鑒中缺席，無法參與這場數字競賽。當《政治家年鑒》於 1864 年首次出版時，編者特別在序言強調「為確保事實和數字的多樣性和絕對正確」(has to be insure an absolute correctness of the multiplicity of facts and figures)，此書主要取材自官方文件(official documents)，其次才由權威書籍(authoritative books)、有影響力之報刊(influential newspapers)、雜誌(magazines)和其

100a-101a。

³³ 徐勤，〈丁酉列國歲計政序〉，《知新報》，24(澳門，1897)，頁 4b。

³⁴ 陳慶年，〈列國歲計政要答問〉，《時務報》，61(上海，1898)，頁 1b-2b。

陳慶年(1862-1929)在文章開頭還批評「鄭君之敘不足以明之」，顯是認為譯者鄭昌棧的序言未能說明數字之於富強的關聯。

³⁵ 陳慶年，〈列國歲計政要答問〉，《時務報》，61，頁 2a-2b。

他可信賴資料作補充。³⁶然而，僅僅晚約十年左右，當中國接觸並嘗試著手編纂這類書籍時，才發現自身關於量化知識與資料是如此貧乏。於是，從社會各界熱切追求和探索的現象折射出一種知識匱乏的困境；亦使得富強問題在數值資料描述下，更顯具體與確實。就像梁啟超根據《丁酉列國歲計政要》的數字，證成中國在疆域、學校、商務、輪船、鐵路、兵力等比項，遠落於西方世界之後；甚至有項目是「無足比數」的。³⁷亦有如湯壽潛(1857-1917)根據《列國歲計政要》指出清帝國對「教民」數字「茫有未知」，遠不如西方世界對自家教民數量是「朗若列眉」。³⁸這兩個例子反應了雙重的焦慮感，推升了公共領域對數字的需求。中國不僅缺乏統計數字，更少了從數字上勝過西方列強的國家實力。於是，數字一方面詳實說明了異國他者的樣態，亦使清帝國從他者身上看見自己的落後之處。流通於晚清知識社群間的印刷文化，讓統計知識走出文本框架，更加地公共化。這樣一來，數字不僅具象化清政府面對的現實困境，更揭開了晚清數字政治的序幕。

三、「統計必以表式行之」：以數字為核心的新表述方法

隨著《列國歲計政要》的輸入與流行，與數字一同映入國人眼簾的還有表格這種表述方式。表格被視為一種解決現實問題之要法，即

36 Frederick Martin ed., *Statesman's Yearbook: A Statistical, Genea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State and Sovereigns of the Civilized World*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867), vii.

37 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集，頁211。

38 這條資料是讀自潘光哲的研究。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頁302。

為晚清數字政治的第二幕場景。在《列國歲計政要》出版後，澳門《知新報》於 1897 年開始連載《丁酉列國歲計政要》。徐勤(1873-1945)為之作序時即指出，這種以數字為核心的新表述方式，可供讀者明晰「中外之故、強弱之由」，且得「互相比例」以見優劣。他甚至將表格譽為能將「政學商務」轉化為具體內容的「表學」，是「西人之學」與中學的關鍵差異。³⁹緊接著，同樣關心西學的出版家高鳳謙(1869-1936)也做了編纂統計書文的嘗試。他受到《丁酉列國歲計政要》這種「全用表體」書文的刺激，表明自己編譯新版時也應「宜多列表」，他甚至還回頭批評林樂知版的歲計政要「列表甚少」。對統計表格之重視，可見一斑。相隔約一個月後，《光緒二十四年列國歲計表》一書就在高鳳謙手下誕生。⁴⁰本節即要討論被這些崇尚數字議政者推崇的統計表格，如何成為時人眼中解決現實問題的靈丹妙藥。

甲午戰敗後不久，朝野各方為救亡圖存所做的改革實踐，讓數字和表格在戊戌年間成為關注焦點。當人們都在問，如何確切描述與評估中國與其他先進國家的強弱差距時，統計數字表就成了即時的解答。梁啟超說得明白，他指出，表格這類文本的編排方式「區以國別，分類畢載，冠以總表，藉相比較，國與國比較，而強弱見，年與年比較，而進退見，事與事比較，而緩急輕重見」。也就是說，以量化表述方式為主體的表格，能讓讀者在閱讀中進行比較，進而得悉國家內政、國防、外交、軍事四個範疇底下，各項問題在不同時間區段的表

³⁹ 徐勤，〈丁酉列國歲計政要序〉，《知新報》，24，頁 4b。

⁴⁰ 〈高鳳謙書八〉，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620。此封書信作於二月廿六日，接著在三月廿八日與汪康年通信裡就已提到「弟近譯本年《列國歲計表》，刻用宣紙印就，擬託貴報館代售，數日內即可寄奉」。〈高鳳謙書二十九〉，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 2 冊，頁 1643。此書有被收進：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請見：熊月之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頁 355。

現差異，甚至還可做國與國的比較。這些都有助於晚清士人判斷國勢的優劣變化。⁴¹

沒多久，康有為(1858-1927)和梁啟超聯手發動變法，利用幾次上書機會，康氏將寫滿數字和表格的書籍，呈到了光緒皇帝(1871-1908, 1875-1908在位)眼前。據學者考證，康氏此行帶了《列國歲計政要》和他改編自《丁酉列國歲計政要》的《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⁴²康有為其實很早就注意到這種書籍之於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他主張「比較之表」應該訂定為「百政之統」，因為國家若無生產這類文本的技術，從專責官員到常民百姓，都將無法清楚理解政務的進退曲折。⁴³在他呈送給光緒帝的書文裡，康氏以進化論開場，「凡物進退贏縮之故，率視其比較而已」，說明中國逃不出比較政治的行列。並進一步利用表格與數字，說明各國「土地、財賦、商貨、學校、生徒、兵卒、船艦、鐵路、電線」等政事的具體表現，揭橥中國雖為「民數第一，地居第三」，卻在經濟、教育和現代化設施方面遠遠落後於世界各國。⁴⁴康

41 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集，頁210。

42 孔祥吉，〈《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序〉，收入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428-430。詳細考據請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442、452-454、502-510。特別的是，梁啟超在政治宣傳意味濃厚的《戊戌政變記》中將這段歷史描寫成「又輯十年來列國統計比較表，又輯列國官制、憲法比較表進呈」。但根據現階段的考證研究，並未發現康有為有編輯的「十年來列國統計比較表」、「列國官制、憲法比較表」。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集，頁495。這樣來看，任公的「加油添醋」其實更說明了，統計對於政治比較之功效在當時維新知識分子視野裡的重要性。

43 康有為，《日本書目志》，收入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773。

44 孔祥吉，〈《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序〉，收入孔祥吉編著，《康

氏此舉，可謂以統計立論的嘗試。而由這些表格數字揭露之差異、講述的事實，很可能促成清廷命駐英參贊張德彝(1847-1918)推動新編列國歲計書的計畫，不過此構想最終未能付諸實行。⁴⁵就在戊戌年即將告終之際，高鳳謙寫信向汪康年(1860-1911)感嘆，自撰之《光緒二十四年列國歲計表》「無甚用處，銷路未必廣」。⁴⁶知識人嘗試編纂統計表的結局，和政變的嘎然而止若合符節；也隱隱然說明統計數字和表格雖已進入晚清知識人的視野，卻很難在實踐面上有長足進展。

阻礙這類書籍生產的原因，除了翻譯手法、資料取得及考證等難處外，本文認為編寫格式和體例也是可能的原因。「須於簡明詳洽之中照我華書體例而又不背於原書」，張德彝在日記中記錄他受命編纂列國歲計書的過程，其中這段話引起筆者對於「體例」的考慮。事實上，當時朝野關注的「表學」，其設計及編纂原理十分接近我們現在熟悉的統計表格。它的訂定與運用，關係到資訊搜集以及展示的形制，這可能是晚清還未完全掌握的新的表達形式。

有為變法奏章輯考》，頁 428-429。康有為，〈《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收入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4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346-370。康有為在每一種表後都做了簡短案語。譬如「比較每英方里人數表」，康氏指出中國號稱「眾民」，但若從人均地面積來計算，則非萬國之首。在「各國比較商務表」後，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統計中排第十二，康氏更進一步加入人口總數指出，「舉大地最貧之國，以民數勻計，無有若吾中國之貧者。」「民數以吾為冠，而貧以吾為殿。」關於《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還可參見：王曉秋，〈康有為中外比較仿洋改制的另一代表作：《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新探〉，《北京社會科學》，2020：1(北京，2020)，頁 12-20。

45 牟國義、沈萌濤，〈《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鑒譯介〉，頁 38。張得彝，《六述奇》(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159、161-162。

46 〈高鳳謙書五十二〉，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 2 冊，頁 1660。

對清人而言，統計表格是一種出現於 19 至 20 世紀之際，以數字為核心的表述方式。使用表格，意指用數字降低文字敘述的份量，讓量化資料成為人們吸取新知最主要且精準的媒介。統計表格興起的主因，就是晚清逐漸出現的社會調查。連玲玲及葉韋君指出，社會調查風潮帶動了表格和圖例的大量使用，呈現數字作為主要表述工具的新形式。以表格為主體的調查文本，為強調實證精神，較少使用情緒性用語，而是用客觀數字表達。結合數字與少量文字而成的表格，在製作填寫和閱讀理解兩端，遠比書面文本更易傳播、接受和閱讀，讓政府和知識人都十分肯定其可用來搜集、整理與表述家國事務。⁴⁷於此，本文想進一步追問，這種新文類是建立在何種知識實踐基礎上，以致其易於流通和接收？時人在製作表格時的考量與意義又是什麼？筆者認為，這是一段國家學習以數量治理社會，以及人民學習運用另種資訊表述來認識世界的過程，而此過程則是在「統計表格作為一種可靠知識形式」的歷史場景中方得展開。

統計表格能將事務分類析論，並在特定時間軸線上呈現變遷和規律，是有別於傳統文字描述和評估世界的方式。我們先看統計以數字論理的特點。據統計學史研究，自 19 世紀起，分類(classificatory)與分析(analytical)這兩種推理模式(modes of reasoning)即逐漸滲透西方公眾社會，奠定了數字作為資訊流通及展演的基礎。分類是計量過程中必須的環節，它能設計合理的描述類別，以利於搜集和計算統計資訊。分析則

47 連玲玲、葉韋君，〈製作新文類：晚清報刊的社會調查〉，《東亞觀念史集刊》，20(臺北，2022)，頁 467-525。該文提及表格為主體的調查文本使用客觀數字，較少使用情緒性用語處請見頁 502-503。當時還有人認為傳統史書的「十表」與「西人算書對數即列為表」在立意和目的上是相通的。潘清蔭，〈經史之學與西學相為貫通說〉，《渝報》，2(重慶，1897)，頁 19a。本文僅找到一條材料，顯示這種經驗親近性的影響可能有局限性。

建立在分類的基礎上，讓人們可將單一、單個的研究對象或主題，拆分成可評量、測重、比較與對比的複數組成成分。統計學的基本原理就是運用這兩種推理模式，將人類社會合理地拆分為類似且關聯的項目，將個別元素放入整體，考察其關聯、偶然之律則。⁴⁸也就是說，當各類統計數字與資訊在公眾社會大量流通，人們認識眼前世界的方法，就無法脫離這兩種推理模式。

接著來看表格本身。「表格」(tables)在西方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 2500 年左右。在實踐類型上，最顯著的分野出現於 17 至 19 世紀，歐洲國家逐漸採取「時間序列的分析方法」(time-series analysis)來觀察資料變遷。這促成了近代數理統計的發展，也更進一步讓統計表格被廣泛用以分析經濟、衛生、法律等社會現象。到了 19 世紀，歐洲國家更紛紛創設機構管理自己的統計數字，並製造大量可歷時性與共時性說明變遷的統計表格，流通於公眾眼前。⁴⁹「圖」(graph)則是另一種視覺性的表述方法，以線條和圖形呈現統計結果，包括點與點之間的直

⁴⁸ Tom Crook and Glen O'Hara, "The 'Torrent of Numbers': Statis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Britain, c. 1800-2000," in *Statis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Numbers and the People in Modern Britain, c. 1800-2000*, ed. Tom Crook and Glen O'Hara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6-19. 白安雅也指出分類的重要性。她提到，摩爾斯(H. B. Morse)建議赫德改變刊物中關於統計資料的分類方式，不要按照各關港口來分類，應該按照商品區分，才可能被大眾閱讀和利用。但當真要執行時，赫德卻又遇到西方分類方式是按照字母，中國則得依照商品屬性的問題。Andrea Bréard, "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621-622.

⁴⁹ Tom Crook and Glen O'Hara, "The 'Torrent of Numbers'," 19-20. 另可見哈金(Ian Hacking)描述普魯士建立行政官僚體系過程中的統計問題。他提及，當國家為掌控自身數字設置了中央統計局，並戮力於出版各種統計資料以求流通於公眾社會。此舉最後製造了「雪崩般」的統計表格。伊恩·哈金著、劉鋼譯，《馴服偶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40-51。

線、折線(line graph)或扇形圖(pic chart)。最早由 18 世紀蘇格蘭工程學暨政治經濟學家普萊菲(William Playfair, 1759-1823)發明。⁵⁰進入 19 世紀,以表格與圖兩種方式表述的統計數字已廣泛流通於歐洲社會,閱聽大眾也習慣以「數字理性」(numerical reasoning)的方式進行訊息傳遞、知識生產及相互溝通。⁵¹也就是說,映入晚清士人眼裡的表格,是一種能將事物分門別類,透過比較來呈顯問題癥結的新知識實踐。

1909 年 2 月,預備立憲的主責機關憲政編查館發下一份《統計表總例》,開宗明義地說「統計必以表式行之」,揭示了表格之於預備立憲的重要性。⁵²早在維新時期康、梁師徒即已倡議的表格,清廷一直要到新政階段才意識到必須採取制度性措施,將政治考察館改制為憲政編查館,專責「編制法規、統計政要」。⁵³其工作內容分為「編制」與「統計」兩部分,前者負責法例擬訂,後者則與國勢實情的通

⁵⁰ Tom Crook and Glen O'Hara, "The 'Torrent of Numbers'," 20.

⁵¹ Tom Crook and Glen O'Hara, "The 'Torrent of Numbers'," 16. 本文並不是要討論晚清社會有無出現「數字理性」,人類社會有無完整的「數字理性」都還有探討空間。本文是將統計表格運作背後的比較、分析行為看作一種特定的知識實踐。

⁵² 〈憲政編查館奏遵辦民政財政統計編訂表示酌舉例要摺并單四件〉,收入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 1 冊(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 593。

⁵³ 〈考察政治館改為憲政編查館諭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45-46。彭劍,《清季憲政編查館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8-11。筆者認為,憲政編查館正可作為觀察官方立場和主張意向以及各項措施沿革的切入點。但須說明的是,本研究設定方向並未涉入立憲過程中集團政治的問題,故暫不處理如皇室、編查館、地方督府和紳士集團如何可能干涉到這件工作的設定與進行。僅將編查館端出的文件視為來自中央政府的主張意向。

查遍考有關，兩者均「於憲政為經始之圖」。⁵⁴進一步說，憲政編查館對統計工作的規劃，其實和國家亟欲掌握「全國之情勢」和「外觀世界之競爭」，通過「國勢強弱，參互比較，以定施政之方」的現實需求和焦慮密切相關。⁵⁵為此，清廷企圖建立一套縱橫交錯，由中央至地方並旁及各部院的治理體系，並循一套標準化辦法來運作全國調查及統計事務。這使得各地統計工作都得「按照本館頒定格式，詳細列表，隨時咨報」；⁵⁶各類數字由基層搜集往上匯送，即得「彼此對勘，互為鈎稽義例，不至參差」。⁵⁷這套系統最終目標，是能在「畫一」的數值資訊基礎上生產「全國統計表」及「各國比較統計表」；⁵⁸也就是一部出於中國立場、資料的「統計年鑒」。⁵⁹

1909年的《統計表總例》就是為此目標擬定的。清政府此時方意識到，統計資料能將中國轉化為一個數值化的認知空間(cognitive space)，⁶⁰是有助於政治決策的材料。至是，經由康、梁變法帶入官方視野的年鑒文本，在晚清最後十年的大規模改革工程中終於佔有一席之地。只是

54 〈第十五號奏稿〉，收入陳湛綺責任編輯，《清憲政編查館奏稿匯訂》(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4)，頁91。

55 〈第十五號奏稿〉，收入陳湛綺責任編輯，《清憲政編查館奏稿匯訂》，頁90。

56 〈第十五號奏稿〉，收入陳湛綺責任編輯，《清憲政編查館奏稿匯訂》，頁109。

57 〈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令各省設立調查局並擬呈辦事章程摺(附片並清單)〉，《東方雜誌》，5：1(上海，1908)，頁24。

58 〈第十五號奏稿〉，收入陳湛綺責任編輯，《清憲政編查館奏稿匯訂》，頁109、102。

59 除官方檔案外，在報紙上也可以看到政府規劃編纂統計年鑒消息的刊布：〈咨編統計年鑒〉，《廣益叢報》，160(重慶，1908)，頁1。〈統計年鑒(錄自《神州日報》)〉，《四川官報》，32(成都，1909)，頁70。

60 Andrea Bréard,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odernity*, 181.

此目標最終未得實現。⁶¹這份《統計表總例》訂定了全國民政、財政統計工作準則——「格式雖貴周詳，事實每多遷變，往往例由事起，而事與時移」——是一套詳細、統一又具彈性，能因特定時空、事物情狀調整的格式。⁶²下文即討論該文件設計的思路，以考慮清政府高度重視表格的原因和意義。⁶³

《統計表總例》列出十四項「參考中西斟酌義類」所訂定的要點，強調統計工作並非西方特有的知識，中國理應也能執行。⁶⁴這十四項要點共有六項特徵，反映了清政府對統計表格的認識。第一，國家現在要操作的調查和統計，「並非全襲西文，亦是闡明舊法。」也就是說，統計工作並非全數移植自西方，而是有悠久中國文化傳統。例如〈禹貢〉、《周官》、漢代郡國上計這些官書和行政制度，均有著重數字資料的傳統。甚者，司馬遷在《史記》裡仿效《周譜》所造之表體，更顯示中國古籍裡已有製表的經驗。第二，這件工作必須有固定時限，且逐年輪替。全國執行的起訖時間需得統一，但不必要完全模

⁶¹ 彭釗，《清季憲政編查館研究》，頁19。

⁶² 〈憲政編查館奏遵辦民政財政統計編訂表示酌舉例要摺并單四件〉，收入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1冊，頁589。

⁶³ 關於立憲政治的研究十分著重憲政法制面向，與計政相關的問題較被忽略，討論焦點也偏重於憲政編查館的編制局。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清政府立憲失敗是否導向革命？」的問題始終是晚清史和立憲史的研究焦點。筆者認為，結合政治史、社會史和制度史角度來釐清政府統計、調查工作實際執行過程與成效，是值得且必要的。結合這個面向，或許更能幫助我們認識從新政到立憲的歷史場景。惟本文旨在討論憲政編查館這份統計範例的內容和思想意涵，尚未探討政策實際執行面的狀況和問題。這部分筆者規劃另文處理。

⁶⁴ 〈憲政編查館奏遵辦民政財政統計編訂表示酌舉例要摺并單四件〉，收入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1冊，頁593。

仿西國會計年度，而是在自己的時間規律中執行，一年一報「不得遲逾」，為的是求「以示標準而昭畫一」。第三，國家必需準備樣式統一之表格，讓全國人在同一標準下操作；又得循階層、地區之別設計彈性執行空間。統計局嚴格規定其格式，長為「營造尺一尺二寸」、寬則「九寸」，表內格線可隨情況調整，但外觀物理形式則「不得擅改」。另一方面，工作得依照負責國政事項之「部」做「門類區分」，各部門得設定專屬的統計表格，供各部做「參互考證之事」；又依地方行政制度邏輯，在「部」的總表下設定各層政府如省、縣、鄉級的分表。第四，這件工具的內在表述邏輯必須統一。表格以經緯線交錯組成，兩處分別以固定項目呈現：空間(地)、事件(事)、時間(期)、數字(款)，調查者按項填入，閱讀者循跡翻讀。再者，統整計量單位，不可隨意取用；數字也只能用「正書」(非阿拉伯數字)為書寫方式。第五，表格是一種文字敘述量偏少的工具，僅有的文字就是調查事項或單位，其精確與易讀性就是重點。是時特為新舊觀念、詞彙交遇混用之際，新詞舊語之別必須詳加註明。第六，這件工作旨在追求精確事實，必需改變過往地方「例報冊案」、徒存文具的心態和做法，進而清查中國社會內部各項需要調查的「事實」。有些調查項目得與他國相同，有些則可顯示中國獨有，才能在積年累月後編成「統計年鑒」，讓中國站上以統計數字打造「必有比較，乃有競爭」的國際政治舞台。⁶⁵

這六項特徵指出兩個現象值得進一步思考。第一，似乎有種表格形式主義傾向出現。從中央重視統計表格的態度來看，政府是將「設計標準化形制之表格」，等同於可以獲得真實可信的數字。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很可能相信表格本身，更勝於思考獲取數字的方法和過程。

65 〈憲政編查館奏遵辦民政財政統計編訂表示酌舉例要摺并單四件〉，收入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1冊，頁593-597。

前文提及的徐勤、康有為、梁啟超、高鳳謙等人，也似乎以表格為解決現實環境問題的手段。這就牽涉到，即便編列固定形制的表格，但被填報進去的數字卻不一定能如實反映現況；有些數值甚至會因外力影響而虛報。但推進和主持新政的知識人與官員，似乎還未意識到這些潛在問題。他們對表格的崇奉，正讓國家走向這種表格形式主義的困境中。⁶⁶

第二，統計表格帶來一種跨越時空的統合感與認同感，這是建立在能將國家事務分類以相互比較的基礎上。為了讓表格中的數字說話，這份表格從外觀形制到內在表述，都必需由一套新的邏輯重新規範。它預設了表格製作者和閱讀者在拿到文件的第一時間，都能在一種相同、沒有任何差異的語境下展開操作與理解。這張表格甚至能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利用一致的分類和計量，透過地方分層的設計，在起訖時間嚴格規定的情況下，在每一張表格上建構出一個共通的時空環境。迪迪埃(Emmanuel Didier)曾指出，全國性的調查統計與國家作為「一個」的統合形象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他以經濟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透過國家統計制度搜集與整合各地農產經濟資料、數字為例，討論調查以及統計過程中各項物理形式、方法和規範(manners)，包括設計調查表、數字搜集，到報告產出並向全國公佈，在繁複但又追求整齊劃一的工作過程中，美國的國家統合形象與認同(America as a whole)如何逐漸形成。⁶⁷我們可以推測這種統合感的想像和認同，是國家施行社

⁶⁶ 近年有一部研究近代中國教育統計的碩士論文，作者指出晚清新政改革中，關於教育統計部分就有許多填報者為求實質表現而虛報數值的現象。請參見：許瑛芸，〈數字化管理的野心：近代中國的教育統計(1902-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頁 11-39。

⁶⁷ Emmanuel Didier, *America by the Numbers: Quantif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Birth of National Statistics*, trans. Priya Vari Sen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20).

會治理政策時的間接產物。憲政編查館設計的這份例則，意謂它在推展這項全國事業時，已然意識到在進程上必須求取單一規範，從中央到全國各地，乃至最小地方單位，都要循統一時程與辦法施作。於此，不論是身處何方的讀者，閱讀表格裡的調查事項與統計數值，在一致的分類標準和計量單位上，即可瞭解自身實際情狀及其與全國之關聯。更甚者，我們還能想像未來有一天，當國家年鑒編纂完成後，讀者還可透過這些表格裡的數值，理解中國在物競天擇世界裡的位置和序列。

新知識實踐成為人們面臨政治困境時看似有效的解方。從戊戌變法到預備立憲，隨著政治危機加劇，統計表格也逐漸被知識人與政府認同為一種可靠且真實的知識形式。伯克(Peter Burke)討論知識形成問題，指出從資訊轉化為知識有一段「分析知識」(Analysing Knowledge)的複雜過程，牽涉到量化(Quantification)、分類/歸類(Classifying Knowledge)、比較(Comparing)等步驟。伯克指出，18至19世紀間，隨著歐洲各國建立統計部門、機構與協會，數字資料和表格亦隨之興盛。表格與圖例建構出一種比文字更為簡潔、清楚，且更能快速呈顯量化資訊的方式。⁶⁸這或許就是晚清帝國所需要的新方法。這和明清的魚鱗圖冊、黃冊，乃至《史記》、《周譜》裡的表，分別用於國家對土地稅賦的詳考和徵集，以及傳達時間演進之意，有很大程度的差異。自從《列國歲計政要》登上晚清歷史舞台，人們開始注意到量化、分類、比較在知識生產上的重要性。這似乎預示了國家與社會兩端必須學習以表格作為資訊管理與展演的新工具。而這股「統計表格作為可靠的知識形式」熱潮就成為晚清數字政治的關鍵問題，它反映了作為統計後進國的中

⁶⁸ Peter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6), 57, 60-64.

國，如何擺脫缺乏數字的困境，甚至不惜陷入形式主義泥淖，也要向世界生產和展示更多數字。

四、「調查貴實」：數字即等於眼前所見的事實

中國缺乏統計數字的事實，引發時人以調查和統計追求事實的熱潮，這就是本節描寫晚清數字政治的第三幕。當時有不少資料揭露了這樣的現象：人們逐漸認為凡事都應該透過數字表述才是事實。也就是說，必須援引經由調查和統計過的數字，才能產製真實且可信的知識。筆者現階段觀察，支撐這個現象的，是一種批評傳統中國處理事務時慣於模糊與不精確的論述。它得出的推論是：國家必須能對政治、經濟、社會及其他事務進行詳實調查和精密計算，以獲取數字知識，並發展成一套制度化的管理技術和行政體系。也就是說，中國必須學習統計學以建構計政體系。這個主張逐漸演變成兩個相互關聯的場景。其一，強調資料真實性，必須仰賴實際調查來廣蒐各地材料，才可能獲得事實。其二，強調傳統知識的產製方法與現代的調查統計法相互對立，以說明前者為何無法書寫關於中國的真相，而這一塊主要是環繞著統計學與歷史書寫的關聯展開。這兩個場景大致出現於 1911 年前後，突顯了知識實踐的現代轉型——以中性的統計數字為認定「事實」之依據。這是解決眼下困局的要務，中國必須盡可能地搜集足夠的數字，以便從事實的角度來瞭解自身的現況與困境。

克服國人模糊與不求精確的習慣是首要目標。在諸多論述中，最有力的或許是他者的聲音。1890 年，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出版了《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展現西方人對中國社會的想像與觀察。魯迅(1881-1936)很注意這部書，在日本求學時就閱讀了日人澀江保(1857-1930)的譯本，後來成為他思

考國民性議題的知識基礎。魯迅逝世前幾日還提到，希望這部書能儘速翻譯成中文。⁶⁹這個心願得到 1937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社會學家潘光旦(1899-1967)譯著的《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才得以實現。該書第二篇「中國人的特性」就是選譯明氏原著的 15 個章節而成。⁷⁰顯然，魯迅與潘光旦是帶著國民性、民族特質問題來閱讀此書，這也使得明恩溥筆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被放大為中西文化、文明優劣的關鍵議題。

透過明恩溥的觀察和書寫，一個凡事含混的中國社會躍然紙上。該書第六章〈精確性的缺乏〉(The Disregard of Accuracy)描述了一幅無法精確認知外在事物並向他人表述的日常景象。一開始，作者從一個看似「劃一」(uniformity)的場景切入，從長相外貌到衣著打扮都十分相似的中國人，卻會因為各種無法統合之「數量的標準」，製造出許多荒謬的現象。⁷¹這種反諷筆法，突顯了中國在看似統合的社會表象下，基層內部卻散亂不齊的狀態。明恩溥指出，諸如貨幣、土地、距離、貨物、年齡等需要以計量數字來建立基礎認知的場景，人們的反應和認識均是混雜且不精確的。對此，明氏指出，這很明顯是因為各種度量方法和單位尚未標準化之故。而問題核心則是中國人相異於西方人的個性特質，後者對一切事物都要準確掌握(ascertain everything with unerring

⁶⁹ 關於魯迅閱讀澀江保譯本與其國民性思想的問題，本文是參考李冬木，〈「國民性」話語的建構——以魯迅與《支那人氣質》之關係為中心〉，收入李冬木著，《越境：「魯迅」之誕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頁 295-483。澀江保翻譯的日文版是在 1896 年由博文館出版。李冬木推斷，魯迅應該是在 1906 年放棄醫學從仙台返回到東京時接觸此書。

⁷⁰ 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收入《潘光旦文集》，卷 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1-248。李冬木考證，潘光旦此書的節譯部分應該是最早問世的中譯本。李冬木，〈「國民性」話語的建構〉，頁 318。

⁷¹ 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Revell, 1894), 48. 「數量的標準」語出：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收入《潘光旦文集》，卷 3，頁 65。而潘氏選譯第六章時所下的標題為「不求準確的中國人」。

exactness)，中國人則否。這就反映於人們運用數字描述事物時，並不在意其理應具備的精確性，總是以「幾百」、「幾千」、「不少」回應，從未使用準確數字。⁷²精確性不足對社會生活帶來的弊害，在明恩溥筆下展露無疑。1936年，社會學家李景漢(1894-1986)對這篇文章直言：「凡在鄉間做過調查的，無不立刻感覺這一顯著的品性。」⁷³這形同以社會科學家身份肯定了明恩溥關於精確問題的批評。在明恩溥中西比較眼光下，數字的模糊和不精確之習性與國家統合的問題，緊密連結在一起，成為近代知識人批評國民性的思想資源。

當時還有另一種聲音將問題導向制度層面的缺陷，特別是有關統計知識和制度的討論。1913年，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William James Calhoun, 1848-1916)分析美國對華的經濟援助時，點出「中國於統計上實無精密之制度」。他指出，中國因缺乏完整嚴密的統計制度，無法確切說出自己需要怎樣數目的金援。他舉軍費為例，中國報稱有兵員120萬，但美國調查為40萬，兩邊差距甚大。這種批評由外人道出，顯得格外強烈；在《東方雜誌》的轉載下，更讓這種無法追求精確的問題，和中國「國民文明之程度」緊密相連，揮之不去。⁷⁴

關於知識和制度面的缺失，在與西方列強的比較下更被放大檢視。數次提及統計學對現代學術發展重要性的梁啟超，便認為中國普遍缺乏統計資料。任公在《新民說》第十四節〈論生利分利〉，打算利用「中國民數」剖析人口組成中生產經濟利益者與分潤經濟利益者

72 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5.

73 這句話出於李景漢為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所作的序文。李景漢，〈序〉，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收入《潘光旦文集》，卷3，頁14。

74 〈美國前駐北京公使嘉樂恆君在紐約演說中國大局及美國對華之政策〉，《東方雜誌》，10：4(上海，1913)，頁40-41。

的分布狀況。但在展開論述前，他先點出「中國無統計，雖有巧算，萬不能得其真率」。也就是說，中國的計量技術僅是「巧算」而非現代的統計制度。這讓他無法獲取真實狀況，僅能舉出「鄙見臆度」的數字。⁷⁵類似的論述還有陳獨秀(1879-1942)〈新青年〉一文。該文嘗試比較中國和世界各國青年疾病和死亡率，陳氏指出「倘有精確之統計，示以年表，其必驚心怵目也無疑」。也就是說，因為缺乏統計數據與可呈現的逐年變化趨勢，讓他僅能以「青年體弱，又不識衛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這種質性描述說明。⁷⁶接著，陳獨秀筆鋒一轉，舉德國、英國、日本青年死亡率為例，運用特定時間區段的調查、統計資料如「一九一二年之統計」、「今之統計」、「最近調查」，勾勒出三國青年死亡率逐年下降的趨勢，以呈顯中國青年身體素質的顯

75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609。「巧算」一詞顯示梁啟超認為在現代統計學之外的計量技術都不夠精確。然而，以現在我們對於明清商業帳簿的研究來論，當時的複式簿記技術已十分純熟，絕非「巧算」。梁啟超此言，透露了他重視國家事務的政治算數（人口數），低估或忽略了民間領域數字知識。這牽涉一位審查人建議應該思考，「作為政治算數的數字知識和作為民間生活領域有用的數字知識，或者作為表象經濟、社會規律方式的數字知識」，不同領域數字知識的關係，以及時人的理解與認識。梁啟超的意見確實反映審查人指出的，「政治領域和描寫社會規律」與「民間生活領域、經濟活動」，兩個範疇的數字知識正在時人眼中逐漸分化。本文著重的政治危機和西方競爭壓力所觸發對於中國政府治理技術的質疑，或許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其餘的經濟、社會、文化因素還有待進一步探索。感謝這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建議。

76 陳獨秀，〈新青年〉，《新青年》，2：1（上海，1916），頁1。以筆者搜查所見，這類聲音一直到1940年代都還能看到。如以下這條：「腳踏實地借助於數字，以求真實的結論，足以藥國人籠統、含糊、雜亂無章、尤其對於數字不求正確的毛病。」李絜非，〈歷史學與統計學〉，《東方雜誌》，39：17（上海，1943），頁39。

著頹勢。梁啟超和陳獨秀的論文，原意為描述歷史或當世現象，卻不約而同地揭露了因缺乏統計數字導致推斷和論證不夠精準的問題。

知識和制度的缺漏，使得中國無法蒐集有效且可信的數字，引致人們開始提倡要注重資料的真實性。接下來筆者要進一步描寫，順著批評國人不精確衍生的第一個歷史場景——強調資料獲取方式和可信度問題。晚清之際，開始有論者思考該用何種方法來獲取真實資料。這推導出人們必須通過實地調查才可能獲得可信任資訊的想法。如晚清社會調查運動先驅的留日學生地方同鄉會，他們在同鄉刊物上宣揚這種知識實踐時，就特別著重這點。《湖北學生界》主張國人應該掌握故鄉的調查權。他們指出，外人來中國是秉持「揚子江半支之水，大戈壁一粒之沙，其何者非他人所能聚鹽米而數之者」的精神在探查國情，國人卻僅是「取六部案牘之故紙，舉四庫風土之舊書」。這兩種知識實踐的態度和方法差距甚大。「無事不有調查會」和「乞靈於塵封之公牘」，一種強調實地親見與考察，以及秉持著猶如計算鹽米這類瑣細事務的計量行為與經驗；另種則僅是仰賴既有文書記錄為認知依據。兩者一來一往，突顯了中國人民無法全盤掌握攸關家國之事實及真相的困境與原因。⁷⁷

環繞著對官方生產之人口、財政這類基礎數字的不信任，論者逐漸形成一種將數字和事實聯繫在一起的主張，認為用數字表述的意見就為真實。梁啟超討論中國歷史的人口時，直接指出漢代設置「計口課稅」，將人口當作課稅基準的作法，民間為「避賦役而自匿蔽」，乃至「吾儕今日欲求一徵信之統計表而不可得」。文末，他更表達「吾中國官牘上文字，多不足措信」，「猶未敢謂其實錄」；這問題惟有

77 〈附湖北調查部記事：湖北調查部記事敘例〉，《湖北學生界》，1(東京，1903)，頁131-146。

待新政府成立並推動大規模調查，才可能解決。⁷⁸任公此文，呈現了中國政府因未能執行現代調查方法與統計，以致無法掌握人口數量的事實。

缺乏對中國現況的真實理解，正是二十世紀初期，清政府在預備立憲階段時嘗試解決的問題之一。前文提及憲政編查館規劃國家統計工作，其核心理念就為「考察各省事實」。⁷⁹這個觀念幾次出現在推動立憲的官方文件中。例如，為考覈州縣政務執行情況，奏稿末尾就有「朝廷實事求是之至意」，要求各省編列政務「事實表冊」。⁸⁰官方在對外說明設立統計局以及各部院、各省之統計處和調查局時，表示「朝廷綜核庶政，實事求是之至意」，必須透過統計、調查局處等部門蒐集各地「事實足資參考」，而非「徒磨勘賬籍、繪演算式而已」。⁸¹除卻中央立場外，更有海外留學生撰文呼籲「統計不可再緩」，反覆強調統計工作是「國家著明事件之學」。從這篇文章的脈絡來看，「著明」一義即指能精準掌握如人民、領土、農工商、財政問題的數據，以求廓清國家政治、經濟範疇的事實。⁸²亦即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謂的「標準化事實」。⁸³這類意見集中出現在新政改革初期，反映

78 梁啟超，〈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287。

79 〈憲政編查館奏請飭令各省設立調查局並擬呈辦事章程摺〉，《現世史》，1(廣州，1908)，頁12。

80 〈第拾貳號奏稿〉，陳湛綺責任編輯，《清憲政編查館奏稿匯訂》，頁46。

81 〈憲政編查館奏遵辦民政財政統計編訂表示酌舉例要摺并單四件〉，收入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1冊，頁588。

82 言之，〈統計不可再緩論〉，《雲南》，10(東京，1907)，頁1。

83 斯科特指出，當學者或官員欲將國家某面向的狀況，轉納入某種調查和計量的統計表格中，就是將複雜的地方社會簡化為國家所需之客觀事實。這使得調查和統計就是近代國家中央政府欲提升直接管理效率和信度的知

了從知識階層到中央政府一致認為，必須改變以往搜查資料的方式，以實地調查和精密統計來獲取可信度高的數據。更重要的是，通過新知識實踐所獲取的，其實是高度政治化的數字。它們說明了，中國若缺乏統計數字，就「無怪乎欲求公安而仍昏亂」；國家公眾事務如不安穩，就只能等著迎向「長此昏亂以待滅亡」的未來。⁸⁴

數字能客觀地說明社會現象、產製國家需要的知識，這想法不單出現在國家事務的統計工作上，還和當時討論歷史書寫的文論連繫在一起，呈顯傳統歷史書寫如何受到統計知識的挑戰。這是本節要描寫的第二個歷史場景——統計學之於史學現代轉型的關聯——由此考慮數字如何被知識人視為事實。這就牽涉到梁啟超拿數字來整理史料、推論史績——「歷史統計學」概念的提出、發展和論辯。過去的相關研究集中在梁啟超以降，丁文江(1887-1936)、衛聚賢(1898-1990)和傅斯年(1896-1950)等人環繞著統計學是否能有效建立歷史推論和解釋的論辯。這些研究讓我們看見，那些宣稱欲持統計方法重探中國歷史與文化問題者，認為在這種知識實踐輔助下，即能引領史家「觀其大較」，根據統計數字，「知道事實上『如此如此』」，進而追問箇中原因。⁸⁵在這

識、技術基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著，梁晨譯，《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臺北：麥田出版社，2023)，頁158。該書前兩章〈自然與空間〉、〈城市、人民、語言〉，分別從政府如何經營自然環境、規劃城市、管理每一個被統治者和國家語言來說明，國家觀察社會複雜事實的視角和特殊性。

⁸⁴ 言之，〈統計不可再緩論〉，《雲南》，10，頁1。

⁸⁵ 梁啟超，〈歷史統計學〉，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5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483、488。關於晚清歷史統計學的討論可參見：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知識和觀念的傳入與清末新史學〉，《史學史研究》，2016：3(北京，2016)，頁28-41。石瑩麗，〈民國學界對於歷史統計學的認同與質疑〉，《史學月刊》，2015：12(開封，2015)，頁26-35。

些史家看來，發展趨勢、因果關係、客觀真相三者就是統計學對中國現代史學最大的影響。於是，中國歷史書寫的非現代性，有部分就肇因於統計方法和數字的匱乏。

對此，本文想以陳黻宸(1859-1917)為例說明數字與歷史書寫之間的問題。陳氏的想法主要出自兩篇發表於 1902 年的文章——〈獨史〉與〈地史原理〉。大抵上，他表達了對中國固有文書中數字資料「虛浮者如故」的喟嘆，並追捧統計學不獨能促成「歐美文化之進」，也能煥新中國傳統史學。⁸⁶其主張清楚展現在〈地史原理〉中關於地理史誌的認識和設計。在陳黻宸看來，一部合格的「地史」必須完整呈現特定地域人民的日常情狀、社會概況和精神特質，這得建立在精確描寫和據實評估環境和人民這兩個面向的基礎上。於此，徹底調查和統計才可能得出最接近事實的真相。以下分成兩部分依序說明。

第一，陳氏指出了獲取與產製資料方式之於文本編寫的問題。陳黻宸在〈地史原理〉中通過檢討中國傳統史誌，建構了「閱讀文本、文字敘述」和「實地觀察、統計計數」兩種知識實踐的鮮明對比。文章開頭，他指出那些僅透過「讀書萬卷」、「日披一紀」和「系覽一傳」就認為可以通盤瞭解「古今治亂之大要，中外興壞之大局」者，是所謂的「盲儒」、「瞽史」。若向他們問起「得失之林，利病之數」，期望得悉弊病之處、程度及源由時，這些人必定啞口無言。⁸⁷陳黻宸指出傳統士人認識與解決問題的缺失，在於不精確的思維方式，無法以數量描述現象或發展狀況，乃至思辨因果關係，發掘弊病所在。造成這類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太過仰賴既有典籍的文字紀錄，但這些都是無法即時反映現況的資料。更重要的是，產製傳統典籍的方法

86 陳黻宸，〈獨史〉，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562-563。

87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 578。

和過程沒有經過量化處理，導致這些文本欠缺將現象轉化為可計量對象的數字資料。

第二，關於處理和展現資料的方式。陳黻宸同樣採取以「表格」解決問題的看法，提出應該以「表」作為書寫地理、歷史的基礎格式。他舉出十種分類表，作為編制新式地理史學文本的要素。有「戶口表」、「宗教表」、「族類表」、「學校表」、「職業表」、「疾病表」，還有他從《歐洲統計記》得到靈感的「罪人表」，以及被認為與中國歷史文明息息相關的「儒林表」、「文明原始表」和「歷代君主表」，上述這些與特定區域人民歷史相關的現象，都要分別立表調查。⁸⁸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列國歲計政要》帶給晚清知識人的刺激，在陳氏對史學書寫的設計中，同樣出現一種將事物拆分成互相關聯的項目，以塑造帶有時間特質的認識世界方式。或許，「表」最吸引陳黻宸的地方就在於，這種以分類論理來重新認識與描述歷史世界的做法。

陳黻宸希望透過調查統計來建立的歷史書寫，其實不脫近代文明史論和觀念的範疇。他認為，史家必須結合史學、政治學、人種學、物理學、生理學及科學、統計學等學科知識，「而後能精能審」，詳盡描述一地人民的歷史發展進程。其中關鍵就是以統計學來梳理人民歷史紛雜線索的能力。陳氏十分相信與佩服統計能處理大量數據，他援引「美之統計家」說明統計學能讓史家得出「理亂循環」、「盛衰變態」的因果關係；甚至能克服將「歷史偶然之事視為天然之勢力」的想法。⁸⁹「精審」之事實和「歷史偶然」兩個觀念，構成陳黻宸思

88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 586、592-601。

89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 586。
筆者目前尚未能比對出此處的原文出處為哪部書籍，出自何人之手，有待進一步考證。

考歷史書寫問題的方向：如何求取中國社會與人民發展之基礎規律以撰寫理想的歷史，並推導出中國在世界快速變遷和激烈競爭之律則中存續發展的可能。

趨於「精審」，是統計學之於傳統史學的關鍵轉變，也是陳黻宸批判過往學人的主要依據。陳氏在〈地史原理〉下半部反省自身的閱讀與寫作經驗。他曾搜集各類史志，這些傳統典籍「縱橫萬里，上下百代」，帶給他豐富的知識世界。但他又嘗試「廢書而起，獨行數千里」，走遍自然景地、鄉野農家與都市城區，而驚覺眼前所見景象與書籍所載相差甚遠。「簡冊所載，徒為陳跡」，「積書充棟，一切皆塵羹土飯之遺」。顯然，史冊文字完全比不上陳黻宸實地走訪的經驗。⁹⁰文本記載本非即時情況，更會隨時間流逝喪失解釋效力。此時他話鋒一轉，提出四個撰史原則——調查貴實、區劃貴小、分類貴多、比例貴精——這四句箴言讀來就像清政府 1909 年頒布的《統計表總例》或 1920 年代後社會調查手冊的基礎規範。這四項原則重新脈絡化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強調要透過小區位劃分、細緻分類和精準比例；同時也形塑了歷史書寫的新規範，展現陳黻宸在知識實踐上追求「精確」的嘗試。⁹¹

「歷史偶然之事」則涉及統計學建立律則時的關鍵：自然規律與偶發性混亂的問題。陳黻宸指出，克服歷史偶然的關鍵在於「征服天然力之大權者」，也就是不受自然環境限制的「文明之民」。⁹²陳氏史學明顯受到文明史論影響，包括英國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英國文明史研究，以及日本接納巴克爾史學後所創造的「文明史觀」。前者強調歷史內在之自然律則的科學特質，後者強調文明進化之於人

90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 591-592。

91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 592-596。

92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 586。

類社會發展的理律。⁹³ 巴克爾的文明史規律，建立在凱特爾(Lambert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 1796-1874) 的統計法則(statistical law)上，他認為人類行為並非自外於自然秩序，雖偶有特殊或非理性經驗，但集體行為積累形成的規律仍證明了，每個人採取的行動仍是不變的社會律則(unvarying social law)的結果。⁹⁴ 由此，巴克爾特別強調文明的形成是奠基於社會與民眾，而非政治人物、機構和事件所製造的治亂循環。他認為政府的行動怪誕且無可預測，全賴社會和民眾才有緩慢且連續的進展，且帶有秩序、調和與規律性(order, symmetry, and law)。⁹⁵ 由是可見，陳黻宸以「文明之民」為「征服天然力之大權者」論，無非是他承繼巴克爾認為社會與人民歷史律則可克服外在環境偶發變化的主張。只是，在〈地史原理〉末段，陳氏卻感歎中國「處二十世紀競爭最烈之時代，我誠不知其後之果何如矣。」⁹⁶ 意指即便運用統計學挖掘中國歷史發展理律，但面對當前的競爭世界，陳黻宸仍未有十足把握能從規律來期待未來。

綜上所述，環繞著量化資料和歷史知識生產的問題，陳黻宸明確表現出對傳統智識操作的負面評斷與背離。這裡面明顯有受到文明史學觀念影響的部分，它強調透過統計學梳理人類社會現象以求得文明演進之規律。陳黻宸的主張反映了他無法在古代經典裡尋得事實的焦

⁹³ 陳黻宸與文明史學論述的關係，可參見：李孝遷，〈巴克爾及其《英國文明史》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史學月刊》，2004：8(開封，2004)，頁89-90。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知識和觀念的傳入與清末新史學〉，頁35-36。近代日本文明史學和中國史學發展的關係，請參見：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3)，頁191-236。

⁹⁴ Theodore M.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63.

⁹⁵ Theodore M.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61.

⁹⁶ 陳黻宸，〈地史原理〉，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頁602-603。

慮感。陳氏的例子突顯了，歷史學者追求以統計數字重述文本之舉，一方面是為了重建歷史真相，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從歷史事實找出中國文明的發展軌跡以期待未來發展。過去很多研究都注意到文明史學和近代中國新史學論述的關聯，事實上，在「我們沒有現代歷史」的呼聲底下，還醞釀著「我們沒有現代數字」的想法。這疑問指向了，中國如何在承續西方統計知識下，展開以精確數量來改變歷史思維、書寫和目標的運動。

二十世紀前後，中國在追逐事實的熱潮中，逐漸形成關於「事實」的新理解：視數字為事實。以定量數字作為具象及表徵的基準，自然是一種「事實」定義和概念的變化。⁹⁷但是，將數字視同於事實這等號背後的脈絡化過程和問題，卻尚未被注意到。⁹⁸也就是說，特定的

97 「事實」概念的轉變，牽涉知識產製過程的各種實踐環節，是知識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目前僅能描寫「語境、脈絡」和「知識實踐，調查、統計」這兩條線索相互交織的圖像。還未及處理的是思想史面向：「事實」的新定義與認識論轉變的問題。即如普維(Mary Poovey)指出，「現代事實」(modern fact)是由定量數字具象及表徵，這是近代英國發展系統化知識及理論的基礎。這段轉向為以定量數據、統計學為知識基礎的過程，是「認識論單元」(epistemological unit)的變化。數字，特別是統計數字，是否及如何成為現代中國的「認識論單元」？這個問題不能只看與統計學、史學相關資料，還得綜理其他層面史料才能處理。現階段筆者同意數字確實在國家急需掌握基礎資訊的語境中成為了認識論的基礎單元；而史學轉型是這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側面。筆者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建議閱讀普維此書來刺激思考。Mary Poovey,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Problem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98 連玲玲對社會調查的研究，就是從調查問題設計的思想文化背景、脈絡角度來討論調查所得之「事實」問題。連玲玲，〈關於婦女的「事實」：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的性別分析〉，《近代中國婦女研究》，34(臺北，2019)，頁 69-128。

數字是在相應的政治氛圍、社會環境、思想文化、選擇與行動中才被認定為「事實」。筆者認為，將模糊與不精確描寫成普遍習慣與制度缺漏，是促成這個等式成立的基礎語境。這部分有來自他者的聲音，也有自我坦承的成分。在統計學尚未成為普遍知識和技術時，那些形塑或賦予既有知識實踐權威的文化傳統與基礎條件，遭遇到因缺乏事實而催生的焦慮感。於是，傳統單純仰賴書寫文本產製知識的方式，此時遂成為被檢討的對象，並在國家現代轉型之際，上升為政治類的公共性議題。為了建立關於中國最真實的認識，國人應該要能全盤獲取與掌握各種事實。在這個問題脈絡裡展開相應的知識實踐，以調查和統計為主，逐漸於晚清民國之際建構了數字與「事實」的關係。只是，知識人還未能知悉的是，他們就像在學習數字的兒童般，得花一段時間來理解數詞標籤所乘載的概念。越是追求事實，他們就越需要坦然接受，統計數字重新概念化的文明標籤。⁹⁹而缺乏數字的中國，就被標註在那個遠遠落後於文明世界的時間尺度上，從過去到現在皆為如此。

五、結論

「數字形塑了現代生活」，意指數字大幅滲透日常生活，影響我們對自我及外在世界的分析、認知和定義。許多相關研究環繞著這個論式，說明數字知識及觀念如何於不同時空環境和條件下，經過長遠的發展歷程而逐漸形成。本文嘗試在中國史的脈絡下追問，數字如何參與現代中國的轉型進程？形塑了哪些面向的特定實踐？積累了哪

⁹⁹ 凱萊布·埃佛里特(Caleb Everett)著，魯冬旭譯，《數字起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頁182。「標籤概念化」的想法引自作者指出，兒童學習數字經驗是一段逐漸理解數詞這些標籤之概念的過程。

些中國獨有的歷史經驗？整體而言，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自我輸入和製造關於數字匱乏的焦慮感，進而形成欲以統計和表格作為解決國家缺乏事實的問題，近似形式主義的做法。當然，我們不能說中國在近代以前毫無處理數字資訊的知識和經驗，但從本文勾勒晚清各界對數字、表格和調查統計方法的熱潮，仍適度反映出自十九世紀中晚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發生了某種變化，值得關注。

本文嘗試從知識史角度來描寫與評估這段改變，特別關注循環流動與日常實踐兩個面向。前者部分，筆者特別描述統計數字如何與晚清政治改革思潮和運動產生聯繫，進而成為人們考慮變革措施的選項之一。至於後者，文章則注意知識形成和運作中哪些實踐環節產生改變，像是搜集、處理、展示資料以形成特定知識的方式與過程，這些細微變化確實影響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與理解。近代中國社會開啟了對統計知識的信任與依賴，也預示了一種以數字為主體的「知識文化」(cultures of knowledge)正於 19 至 20 世紀之交，逐漸形成。¹⁰⁰

新知識文化的發展與非知識領域的變動密切相關，由此揭開了晚清數字政治的序幕。通過《列國歲計政要》的全球流通和在地實踐，統計學在近代中國政治和社會場景中，被塑造成一種可以全盤且如實掌握和定義國家狀態和世界情勢的知識。它向中國展現了政治算數的古典主張：政府統治行為必須奠基於數字，關切國家政務者都必須學習搜集各類數字的知識和技術。數字反映事實，這些「表格化的事實」能夠描述「國家現狀」，並時常「著眼於國家的未來發展」。¹⁰¹這改

¹⁰⁰ Peter Burke,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8. 這是指某種知識實踐、方法、預設、組織形成一種特定文化，而且是複數的，不同知識文化之間彼此存有競爭或共存關係。

¹⁰¹ 對表格化事實的敘述引用自：Eileen Janes Yeo, “Social Survey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變發生在鴉片戰爭後，在戊戌變法期間引起康有為、梁啟超的高度重視，進而將這套知識與當前政治挫敗和未來變革的可能方向連繫在一起，最終在預備立憲階段，清政府從中央立場將原本僅是地方士人局部且片段的作為，嘗試建構以特定知識為基礎的體系和制度。在與世界各國數字的競爭壓力下，中國追逐統計學之舉，實則意謂了「國家」應該是建基於諸如土地面積、人口、經濟活動等各項統計事實的主體，最終間接促成了「國家」的轉型與統合。¹⁰²而就是這種特性，促使統計文本和相關知識在「如何解決國家困境」的思想語境中流通，逐步進入公眾視野裡。就像波特(Theodore Porter)所指出的，數字在公共生活中的權威是仰賴於科學和工程的發展，而量化的公共作用則不能簡化為單純的科學和技術進步，它更是反映在社會與政治的改變上。¹⁰³近代中國數字政治的歷史適度說明了，必須把人們對知識的認知放回到特定時空脈絡中，才能有效理解知識作為行動者的實踐與作用，及其被認識和形塑的經驗。

最後，本文嘗試評估這段經驗被形塑的性質。也就是說，人們對於統計數字的信任是與傳統的斷裂？還是在既有經驗上的延續成果？這得要回到本文引述多數史料的核心疑問「中國沒有數字」上來考慮。面對這個問題，很容易會聯想到黃仁宇(1918-2000)對中國「沒有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 ed.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3.

¹⁰² 有一本討論義大利國家統一運動與統計學的專論，針對「數字和民族性」(number and nationhood)，指出統計數據成為當時人們想像與描繪義大利統一國家樣態的媒介。Silvana Patriarca, *Numbers and Nationhood: Writing Statis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這樣看來，我們也應該思考各項統計措施施行至地方，如何帶給中國社會與人民新的國家想像。

¹⁰³ Theodore M. Porter, *Trust in Numbers*, 115.

數目字管理」的論斷。黃氏指出，中國無法將政府財務和社會商業運作過程中的各項事務，分割為獨立且關聯的事項，轉化為可計算的數值化目標。據邱彭生觀察，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論是建立在「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種相互交織的因素上。這意指傳統制度、組織與文化限制了數目字管理的生成與發展，進而導致中國無法邁向資本主義。而這種技術缺陷，就是中國與現代國家間的明顯分野。¹⁰⁴

本文無意重複黃仁宇的西方中心論述，但也還未能提出全新論點。現階段以《列國歲計政要》討論數字政治的作法，或許僅能嘗試調整黃氏「數目字管理」的提問。如果從晚近對明清商業會計知識和技術的研究成果來看，「能不能」執行數目字管理的提問應已失效。我們反而應該思考，19至20世紀之交的知識人，為什麼會在知悉傳統數字知識和文化的前提下，認為國家缺乏數字？顯然，中國不是沒有數字，而是缺乏當時眾人認為國家需要的統計數據。這似乎顯示，作為政治算數的統計學輸入後，影響了人們對存在於其他領域的數字知識的看法。具備政治算數特性的統計知識與民間領域的經濟知識，兩者在現代轉型期間或許確實產生了不小程度的互動甚或是分化，導致人們在某種意義上低估或忽視了，社會長期發展所形成的複雜且完整的商業計量或其他類知識，進而推導出「中國沒有數字」的聲音。¹⁰⁵

¹⁰⁴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臺北：聯經出版社，1991）。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邱彭生，〈「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臺大歷史學報》，26（臺北，2000），頁351-376。

¹⁰⁵ 必須再次說明的是，本段討論完全是出於兩位審查人提出的問題與挑戰。他們分別從明清帳簿、司法文書裡關於精確計算的追求，以及政治算數知識和民間數字知識兩個範疇的角度，提醒我應該更細緻考慮不同範疇的數字知識，如何互動與競爭，由此來思考「中國沒有數字」的問題背後潛藏的知識史課題。相關討論還可參見註腳75。筆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

這樣來看，我們或許不應該單純將近代中國追逐統計數字的過程，直接看作一場與傳統知識斷裂的革命性發展；更應該去考慮，在新、舊知識實踐交織所觸發的經驗範疇分化與發展下，如何建構社會對統計的崇奉，形塑以統計數字為主體的新知識文化。

一門知識代表了認識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從統計學來認識世界，就必須將我們的「日常經驗化為分類資料」，再藉由數字來記錄、分析和說明。¹⁰⁶只是，數字在現代世界所代表的權威，以及隨之產生的以量化事實為導向的民主制度和技術官僚，也逐漸遭遇到挑戰。¹⁰⁷有論者指出，對抗數字的方法建立在「我們發明了數字，所以我們也可以決定數字的正確使用方式」。¹⁰⁸然而，中國自 19 世紀末踏上求索數字的道路，在近一個世紀的現代轉型時期，這句話或許都得改成：數字發明了我們，所以數字可以決定我們的正確方式。

(本文於 2024 年 3 月 13 日收稿；2024 年 8 月 25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數字作為建構世界的工具：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統計知識與數字概念的建立」(MOST 109-2410-

指正與建議，這個知識、經驗領域分化的問題應該是理解近代中國數字政治的另條關鍵線索，惟目前無法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得規劃它文處理。

106 大衛·史匹格哈特(David Spiegelhalter)著，羅耀宗譯，《統計的藝術：如何從數據中了解事實，掌握世界》(臺北：經濟新潮社，2021)，頁 19。

107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著，王審言譯，《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民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臺北：麥田出版社，2021)，頁 191-198。關於數字和事實的問題，還可參見：喬·貝斯特(Joel Best)著，張淑貞、何玉方譯，《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頁 43、177。

108 桑尼·布勞(Sanne Blauw)著，林曉欽譯，《數字偏見：不再被操弄與誤導，洞悉偽科學的防彈思考》(臺北：今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 193。

H-431-017-MY3)的部分成果。文章撰寫過程中，得有楊采蓁、王崇怡、黃佩雯、童冠傑與張淨嵐幾位助理悉心協助與幫忙，筆者十分感謝。文章初稿曾在以下機構公開發表與多位師長學友交流意見，深有受益，在此謹申謝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臺灣大學文學院共作文明新趨勢計畫「重思規範與現實」讀書會；連玲玲教授、陳建守教授、徐兆安教授、萬毓澤教授、鄭毓瑜教授、傅揚教授。最後，筆者特別感謝《新史學》編委會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使本文論點更為完善，並為我指出未來得持續深掘此論題的方向。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一) 出版史料

- 《廣益叢報》(重慶)。
《東方雜誌》(上海)。
《四川官報》(成都)。
《湖北學生界》(東京)。
《萬國公報》(上海)。
《現世史》(廣州)。
《雲南》(東京)。
《教育界》(江蘇)。
《興華》(上海)。
《知新報》(澳門)。
《銀行週報》(上海)。
《時務報》(上海)。
《新青年》(上海)。
《渝報》(重慶)。
《西學大成》，第1冊，上海：醉六堂書坊，1895。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收入《民國叢書》，第3編第17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據1933年星雲堂書店版影印。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1冊，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6冊，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
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 陳湛綺責任編輯，《清憲政編查館奏稿匯訂》，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4。
- 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5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 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收入《潘光旦文集》，卷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鶴見祐輔，《偶像破壞期の支那》，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據1923年鐵道時報局刊本影印。
- Martin, Frederick, ed. *Statesman's Yearbook: A Statistical, Genealog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State and Sovereigns of the Civilized World*.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867.
- Martin, Frederick, ed. *Statesman's Yearbook: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Annual of the States of the Civilise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4.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大衛·史匹格哈特(David Spiegelhalter)著，羅耀宗譯，《統計的藝術：如何從數據中了解事實，掌握世界》，臺北：經濟新潮社，2021。
- 伊恩·哈金(Ian Hacking)著，劉鋼譯，《馴服偶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朱英，《商民運動(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陳立夫主譯、傅溥譯述，《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四)》，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北京：西苑出版社，2020。
- 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鑿注》，北京：三聯書店，2009。
- 桑尼·布勞(Sanne Blauw)著，林曉欽譯，《數字偏見：不再被操弄與誤導，洞悉偽科學的防彈思考》，臺北：今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 張得彝，《六述奇》，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1。
- 凱萊布·埃佛里特(Caleb Everett)著，魯冬旭譯，《數字起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喬·貝斯特(Joel Best)著，張淑貞、何玉方譯，《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
- 彭劍，《清季憲政編查館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
-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臺北：聯經出版社，1991。
- 黃興濤、夏明方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著，梁晨譯，《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臺北：麥田出版社，2023。
-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著，王審言譯，《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民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臺北：麥田出版社，2021。
-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熊月之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 Alonso, William, and Paul Starr, eds.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7.
- Bréard, Andrea. *Nine Chapters on Mathematical Modernity: Essays on the Global Historical Entanglements of the Science of Numbers in China*.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9.
- Bulmer, Martin,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eds.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urke, Pete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6.

- Chiang, Yung-chen.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rosby, Alfred W.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idier, Emmanuel. *America by the Numbers: Quantif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Birth of National Statistics*. Translated by Priya Vari Sen.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2020.
- Ghosh, Arunabh. *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Halsey, A. H. *A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Britain: Scienc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Östling, Johan, and David Larsson Heidenblad.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 Porter, M. Theodore.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orter, M. Theodore.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oovey, Mary.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Problem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Patriarca, Silvana. *Numbers and Nationhood: Writing Statis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Ital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mith, Arthur Henderson.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Revell, 1894.
-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二) 期刊論文

- 王幼軍、白安雅，〈統計學在近代中國的演變：從社會統計到數理統計〉，《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上海，2010)，頁 61-67、轉頁 74。
- 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32(臺北，2003)，頁 191-236。

- 王曉秋，〈康有為中外比較仿洋改制的另一代表作：《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新探〉，《北京社會科學》，2020：1(北京，2020)，頁 12-20。
- 石瑩麗，〈民國學界對於歷史統計學的認同與質疑〉，《史學月刊》，2015：12(河南，2015)，頁 26-35。
- 牟國義、沈萌濤，〈《列國歲計政要》與近代西方年鑒譯介〉，《中國年鑒研究》，2019：3(北京，2019)，頁 29-42、轉 78。
- 李孝遷，〈巴克爾及其《英國文明史》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史學月刊》，2004：8(河南，2004)，頁 85-94。
- 李章鵬，〈《列國歲計政要》的翻譯出版及其意義〉，《統計研究》，32：9(北京，2015)，頁 104-109。
- 邢宇晨，〈近代中國東學西學與文化傳播：海關造冊處西人作者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23：4(北京，2023)，頁 17-26。
- 邢宇晨，〈海關造冊處：中國最早開展出版貿易的機構〉，《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3(北京，2021)，頁 169-179。
- 邱澎生，〈「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是限制？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臺大歷史學報》，26(臺北，2000)，頁 351-376。
- 袁為鵬、馬德斌，〈商業帳簿與經濟史研究：以統泰升號商業帳簿為中心(1798-1850)〉，《中國經濟史研究》，2(北京，2010)，頁 50-60。
- 許臻芸，〈數字化管理的野心：近代中國的教育統計(1902-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
- 連玲玲，〈關於婦女的「事實」：民國時期社會調查的性別分析〉，《近代中國婦女研究》，34(臺北，2019)，頁 69-128。
- 連玲玲、葉韋君，〈製作新文類：晚清報刊的社會調查〉，《東亞觀念史集刊》，2022：20(臺北，2022)，頁 467-525。
- 傅建木，〈清代民間會計複式記帳概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3(廈門，1983)，頁 73-77。
- 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知識和觀念的傳入與清末新史學〉，《史學史研究》，2016：3(北京，2016)，頁 28-41。
- 韓承樺，〈「社會」的形塑與發展：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0(臺北，2023)，頁 135-176。
- Bréard, Andrea. "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 *Modern Asia Studies* 40:3

- (July 2006): 605-629.
- Jordheim, Helge, and David Gary Shaw. "Open Doors: A Turn to 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59:4 (December 2020): 3-18.
- Lässig, Simone.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da."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59 (Fall 2016): 29-58.
- Östling, Johan, and David Larsson Heidenblad. "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History of Knowledge: Key Approached for the 2020s." *Journal of History of Knowledge* 1:1 (July 2020): 1-6.
- Yuan, Weipeng, and Richard Macve & Debin Ma.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before 1850: insights from the Tōng Tàì Shēng business account books (1798-1850)."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47:4 (2017): 401-430.

(三) 專書論文

- 李冬木，〈「國民性」話語的建構——以魯迅與《支那人氣質》之關係為中心〉，收入李冬木著，《越境：「魯迅」之誕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頁 295-483。
- 車泰根，〈數：帝國的算術和近代世界〉，收入孫江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 2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237-251。
- 黃興濤、李章鵬，〈現代統計學的傳入與清末民國社會調查的興起〉，收入黃興濤、夏明方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頁 1-46。
- Bulmer, Martin,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1-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rook, Tom, and Glen O'Hara. "The 'Torrent of Numbers': Statis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Britain, c. 1800-2000." In *Statis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Numbers and the People in Modern Britain, c. 1800-2000*, edited by Tom Crook and Glen O'Hara, 1-31.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Yeo, Eileen Janes. "Social Survey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ume 7,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83-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Beginning of Numerical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rting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ssential Statistics of Nations*

Cheng-hua H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umbers are fundamental tools for describing and defining both the self and the external world. However, their public nature often creates political contes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ssential Statistics of Nations* (列國歲計政要), a yearbook translated from the 1874 edition of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of Britain. It explores how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text triggered three interrelated social phenomena: anxiety over the lack of numerical data, the emergence of new numerical-based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numbers as equivalent to observable facts. These changes foreshadowed the 1920s, when statistical data and social facts became highly valued. This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origins of numerical politics in late Qing China, allowing a diachronic exploration of how numbers shaped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Adopting insights from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bine two dimensions—social circulation and everyday practices—to illustrate how data processed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gradually became regarded as reliable and fact-oriented forms of knowledge. Statistical methods became a crucial resource for addressing China's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hese imported statistics made the Qing government aware of its lagging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highlights how China's lack of statistical techniques and quantitative data placed China in a formalistic quandary as it attempted to catch u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numerical production. Furthermore, thi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how the state increasingly relied on numbers to concretely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and “facts” brought about by numerous political setbacks.

Keywords: numbers, statistics, *The Essential Statistics of Nation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